

日本真相

涤除胸中数斗尘 扫开历史十层甲

在抗日战争期间，隐居在美国华盛顿的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日本真相》，尘封六十余年之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出版，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作为高宗武的孙子，我愿意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日本真相》（英文原名《深入虎穴》）的撰写以及出版波折的背景情况，如实地提供出来，或许能为历史起到一点参考作用。

1994年9月24日，高宗武的次子夏侯叙五于2004年3月28日，舅沈沈惟道逝世。二妻去世之后，夏侯叙五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的文电手札（日记）及照片等新材料，更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高宗武的回忆录《深入虎穴》。

《Intro. Introduction to Don's》的英文原稿原本两份，一份是放在布面包装，另一份则放在信封。之后，夏侯叙五发现他手写的中文初稿《日本真相》，约十五万字，内容比英文原稿更为详实丰富，可能与他所处时代背景的关系，有些内容当年未被译成英文。高宗武的遗孀高唐都未看到过此手稿。

通过高宗武的遗孀高唐都，夏侯叙五知道高宗武的著书、译书以及出版过程中的一些三折，与美国作为情报处作者的英文原稿《深入虎穴》。

高宗武早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1937年他赶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出版，并负责对外宣传。高宗武在珍珠港事件后，一直担任美国情报处主任。

高宗武在珍珠港事件后，一直担任美国情报处主任。1942年2月完成了中文稿。

高宗武介绍给美国情报处主任约翰·库格林（John Kullgren）帮助编辑此稿，并联系出版。

库格林当时在美国海军部情报处工作（Wa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译者注：库格林当时在美国海军部情报处工作，该部部长是内阁成员之一，美国国防部是在库格林的领导下，高宗武在美国情报处工作，也会读中文。

他在在军部，和库格林一直保持联系往来。

在他的帮助下，高宗武向美国战时信息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

签订合同，将中文原稿译成英文。

负责该项工作的是林白尔（First Lieutenant Paul M.A. Lineberger），主要翻译高宗武的回忆录《深入虎穴》。

高宗武除了提供信息外，也做配合战争所需的对内和对外的宣传工作。

高宗武参与编辑的英文稿（第二版）

斯塔尔先生（Cornelius Vander Starr，也称为史旦，1892—1968）大名鼎鼎，是个传奇人物。

日本真相

高宗武◎遗著 夏侯叙五◎整理注释

湖南教育出版社



涤除胸中数斗尘 扫开历史十层甲

在抗日战争期间，隐居在美国华盛顿的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日本真相》，主创六十余年之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出版。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日本真相》（英文原名《深入虎穴》）的整理以及出版波折的背景情况，如实地提供出来，希望能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些参考作用。

二老去世之日，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高宗武先生的日记、手稿、信件等新材料，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发现了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深入虎穴》（英文原名《The Tiger's Den》）的英文原稿两份。原稿是用硬壳布面包装，另有一本尚未装订。之后，我们又发现了高宗武先生撰写的中文初稿《日本真相》。原稿共有五万多字，内容比英文原稿要丰富得多。可能由于高宗武先生撰写时，对某些内容有所保留，因此英文原稿及中文初稿，通过阅读他们的日记和来往信函后，我才对高宗武先生的著作《日本真相》的一波三折，与美国作战情报处合作的经过（即高宗武先生于1940年5月27日，当时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钱大钧的副官任内，高宗武先生向钱大使请缨，并担任安全全部责任。高宗武先生于1941年1月完成了中文版。魏大使介绍美国朋友约翰·库尔特伦（John Curtin）在此期间，并联系出版。库尔特伦当时在美国作战部军事情报处工作（War Department's Intelligence Division）（作者注：War Department在二战期间统辖全美除海军之外所有军事行动，是内阁成员之一。库尔特伦是1940年成立的）。库尔特伦曾在中南海与高宗武先生多次会面，高宗武先生经常往来。在他的帮助下，爷爷与美国作战信息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作者注：该机构在二战期间负责向盟军提供情报，是战时宣传机构之一）联系，将中文初稿译成英文。负责该项工作的是林白乐（First Lieutenant Paul M. Linberger），主要翻译官是陈爱珊（Ai-I S. Chin）。该机构除了提供信息外，也做配合战争所需的对内与对外宣传作。高宗武先生撰写的英文稿（第二版）斯塔尔先生（Cornelius Vander Starr，也称为史坦，1892—1968）大名鼎鼎，是个传奇人物。



日本真相

高宗武◎遗著 夏侯叙五◎整理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真相 / 高宗武著; 夏侯叙五整理、注释.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12

(书屋文丛)

ISBN 978 - 7 - 5355 - 5871 - 8

I. 日… II. ①高…②夏… III. 日本—研究 IV. 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115 号

日本真相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注释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8 × 1000 16 开 印张: 18 字数: 190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 - 7 - 5355 - 5871 - 8

G·5866

定价: 33.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由高宗武著、夏侯叙五先生整理、注释的《日本真相》一书已编辑完毕,准备出版。为便于读者了解这部尘封了六十余年之久的重要著作,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谨就该书作者的经历和政治立场、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书稿的价值和局限性以及出版宗旨、编辑处理原则等问题作些说明和交代。

一、高宗武的经历和政治立场

高宗武(1906—1994)是近代中国有名的“日本通”,他出生在浙江乐清,早年在家乡求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之后回国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



毅等被刺身亡，史称“五·一五”事件。针对此事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高宗武根据他留学日本的经验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日本之法西斯蒂运动》，投寄给南京《中央日报》。高的文章见识不凡，引起报社高层重视，随即被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先后发表《日本法西斯蒂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一）——总理大臣斋藤实》、《日本新内阁人物（二）——拓植大臣永井柳太郎》等文章。蒋介石很欣赏这位年青人关于中日关系的见解，特意延其长谈，征询日本政坛内情。1933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也对高宗武的文章产生很大兴趣，并邀请他参与外交事务。

1934年初，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该年5月他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任亚洲司副司长，次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从1934年到1937年，高宗武深为蒋介石、汪精卫所倚重，他作为中国的主要谈判者，参与了对日关涉的所有重要事宜，了解诸多谈判内情。

1938年武汉、广州沦陷后，战局对中国极其不利，高宗武自恃其对日本政情的了解及其在日本广泛的人脉资源，积极协助汪精卫开展所谓对日“和平运动”。1938年11月，他与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会谈，达成对后来汪精卫出走有重要影响的“重光堂协议”。1939年2月，他代表汪精卫亲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板垣征四郎、近卫文麿等日本重要军政人物。1939年6月，他又随同汪精卫赴日本商谈“和平”条件。但这两次日本之行的感受，也让高宗武的心情日趋复杂和沉重。高宗武自称在与汪精卫的多次谈话中，都提及日本人“不可靠”，并强调决不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那时无无论日本方面还是汪精卫集团，都有人对

高宗武持怀疑和防范态度,甚至认为其是重庆国民政府的“线人”。

1939年11月,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寓所召开所谓“和运”骨干会议,讨论由日方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加紧了筹划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的步伐。眼看汪精卫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高宗武决定悬崖勒马,脱离汪精卫集团。他巧妙地托人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拍成胶片,然后潜赴香港,与陶希圣联名将此卖国条约在1940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披露,揭露日本侵华的狂妄野心和汪精卫等人的卖国行径,一时震惊了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事件爆发后,蒋介石颇感欣慰,称其为“浙中健儿”,并建议他“最好渡美考察”。1940年3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护照,偕夫人沈愉瑜从香港出发,辗转于同年5月到达美国华盛顿,从此开始了在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隐居”生活。

高宗武不满三十岁即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可谓因缘际会,春风得意,但身处乱世,却因为一脚不慎便踏入歧途。好在他迷途知返,没有加入汪伪政权。初到美国,高宗武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主。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让陈布雷致电胡大使,嘱使馆和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1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撤销了对高宗武的通缉令,并称“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从1941年到1944年,高宗武每年均收到蒋介石特批给他的生活补助费,最高的一年达四千八百美元之多。后来因为时局变化,高宗武生活陷于困境,他便尝试做股票生意。由于他深研美国市场行情,因此在股票市场上收获颇丰,胡适、陈立夫等许多人也托他代理股票业务,一时名声大振,以致有香港报纸称他成了千万富翁。



高宗武一生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他在美国多次致信蒋介石,感谢蒋对他的“知遇之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宗武曾邀请何应钦赴美,在美国众议院反共委员会发表演说,介绍反共经验。1967年高宗武去台湾,最后一次面见蒋介石,再次感谢蒋对他的提携和栽培。

1994年,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享年89岁。

二、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

当高宗武初抵美国的时候,便有许多朋友劝其将日本内部情形以及个人对日本交涉的经验一一写出来,告诉美国国民,因为美国国民一向是关心远东局势的。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两国已由盟友变成敌人,胡适等人对高宗武更是“大义相责”,认为他有义务将自己与日本打交道的“痛苦经验”写出来,为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政坛军界内幕,为最终战胜日本提供帮助。高宗武权衡再三,决定静下心来撰写回忆录,做一个“Factsteller”,书名定为《日本真相》(*This is Japan*)。

高宗武于1942年5月27日开始动笔。当时新上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建议他赶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出版,并答应对其本人和在华亲属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到1943年2月,高宗武历时九个月完成了中文稿,共约十五万字左右。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九·一八后的中国外交方针”,记述了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日交涉的主要内容,间或发表了他对于当时中日局势的观感;第二部分“日本制造傀儡政权”,则以第一手资料详述汪精卫出走及他本人辞职的内情;第三部分“日本

内幕”则是高宗武长期研究日本的心得总汇，内容涉及近代日本的政局演变、民族性格、扩张理论以及政党、内阁和军部的复杂关系。

《日本真相》一书完成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便介绍时在美国作战部军事情报处工作的库尔格伦帮助编辑此稿，并联系出版。英文稿书名定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出乎高宗武意外的是，此书的翻译和出版极不顺利，仅翻译就前后有“与美国作战部情报处合译的”第一稿、“斯塔尔参与编辑”的第二稿以及“索尔兹伯里协助编辑”的最后定稿。定稿共二百五十四页，十四个章节。至于出版更是一波三折，最初联系 Doubleday(双日出版社)，虽经胡适等人从旁大力协助，但双方因多方面纠纷而停止合作。1944年8月，索尔兹伯里协助编辑的最后定稿完成后，他们接洽了六七家出版公司，但都遭到退稿。主要原因是远东和太平洋战局已发生逆转，日本已成了强弩之末，此书价值未引起美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到1945年，二战局势已完全明朗化，德国被盟军占领，日本随后投降。高宗武和索尔兹伯里认为已错过出书的最佳时机，故不再寻求出版。

2004年3月26日，高宗武夫人沈惟瑜在华盛顿去世。高宗武孙子高昕在清理高宗武夫妇的遗物时，发现了《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的英文打字稿两份，随后又发现了中文原稿《日本真相》。无独有偶，就在高昕等清理遗物的过程中，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先生也在朋友的协助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高宗武的《日本真相》英文稿。这份英文稿存在美国外交官索尔兹伯里(Salisbary, 1891—1976)的档案中，很可能是索尔兹伯里在替高宗武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陶恒生先生如获至宝，因为他当年写《“高陶事件”始末》时，不知尚有高宗武的回



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撑,想来总引为憾事。陶恒生先生将英文稿复印后,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将其译成中文,并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正当陶恒生先生有意将此书出版时,他得知高宗武家人已发现该书的中文原稿,并拟与《书屋》杂志合作出版,于是停止了出版高宗武遗著的计划。

《日本真相》一书的英文稿经过多人修改,在结构、内容和观点上已与中文稿有较大出入。因此,从史料学上来说,中文稿《日本真相》比英文稿《深入虎穴》更能反映高宗武的真实想法,所以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三、书稿来源、价值及局限性

高昕在 2004 年发现爷爷高宗武的遗稿《日本真相》等资料后十分惊讶,便将此消息告诉了岳父侯鸿飞先生。侯鸿飞先生时任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平素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他凭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阅历和经验,认为高宗武的遗著《日本真相》等资料很有价值,于是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整理这批资料。他多次往返于北京与纽约之间,将包括《日本真相》在内的一千多页文稿和图片资料全部带回了北京。侯鸿飞先生专业工作甚忙,除了教学、实地调查外,还担任世界地质学会一本杂志的主编,一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实在抽不出时间整理这批宝贵的资料。无奈之下,他将此任务转交给曾任安徽省蚌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的弟弟侯鸿绪(笔名“夏侯叙五”)先生。夏侯叙五先生长期研究中华民国史,所以非常乐意地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整理出《日本

真相》中文稿，而恰好此时他在《书屋》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高宗武旧事》的文章，于是主动与《书屋》杂志联系，洽谈出版事宜。《书屋》杂志考虑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所以决定将此纳入出版计划。

《日本真相》是高宗武在美国呕心沥血写成的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书稿。当年胡适先生在向美国友人斯塔尔先生推荐时，称其“绝对是第一手材料”，“是战时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答应为该书写序言。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外交方针、日本制造中国傀儡政权、日本军政内幕和民族特性等重要历史情况。作者在记述这些史事时将亲身经历与心理分析相结合，重大事件与细节披露相统一，并插录了许多文献档案，对于补充过去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弥补有关抗日战争史书之不足，丰富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和对日本国的认识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在过去，学界对汪精卫出走的具体过程和心里活动、对“高陶事件”始末、对高宗武与蒋介石的关系等问题虽有研究，但苦于没有高宗武的回忆，不能对史料进行全面比较和参证，总是引为憾事。我们相信《日本真相》一书的出版，必能使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获得进展，更加接近于历史的原貌。

该书除了对研究抗战中的中日关系和民国人物关系史有帮助外，还有助于今天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日本国的政治特点和民族性格。高宗武曾在日本留学九年，深谙近代日本的政局演变过程和日本人的性格心理特征。他在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和分析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政党、内阁和军部的关系，对日本帝国主义兴起的根源及其所谓理论言之甚详。另外他还以大量细节刻画了诸多日本人的性格和行为习惯。这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中日关系显然是有意义的。



《日本真相》无疑是一部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稿,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比如高宗武在谈及“汪精卫出走”这一事件时,自认为对此“负七分之一的责任”。这种责任划分是否得当和准确,恐怕很难赢得学界的共识。高宗武向汪精卫介绍过许多日本人,是汪精卫开展对日“和平运动”的重要中介和参与者,有投降卖国行为。特别是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和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重光堂会谈,会后达成了对后来汪精卫出走有重要影响的“重光堂协议”。但对此事件,高宗武在回忆录中基本未予提及,显然有“避重就轻”之嫌。另外在记述他与汪精卫的关系时,他反复强调自己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汪精卫不要轻信日本人,而自己又是如何受到日本人和汪精卫等的怀疑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开脱历史罪责。这些情况是特别需要读者明察的。

四、出版宗旨和编辑处理原则

近年来,湖南出版界出版了一些在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蒋廷黻、何廉等的回忆录,颇受学界关注。此次我们出版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可视为这一出版规划的延续和拓展。当事人的回忆录向来为学界所重视,这是因为他们的亲历亲闻具有某种独特性和不可代替性。诸多回忆录互相参证,有助于解开历史谜团和丰富历史细节,从而使研究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比如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陶恒生先生的《“高陶事件”始末》,但书中引用的陶希圣的一些回忆毕竟属于孤证,如能将其与《日本真相》互相参证,便能极大地增强史料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在编辑处理原则上,我们基本上按手写稿全文照录,以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实在无法辨认的字词,则用方框表示;原稿中漏字,能断定者用括号表示;误字均予保留,更正字加入括号内;原稿无标点或标点不规范者,由编注者统一标点;原稿中所用旧式翻译名称如“希脱勒”、“慕沙利尼”等一律保持原样,由编注者另加说明;原稿中的繁体字均改为简化字。另外,为便于读者阅读和参考,我们对重要的人物、地名及事件均做了注释。相对新颖的史料,如书信、日记等以另体排印,与正文相区别,便于读者摘抄和引用。

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理论水平有限,本书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还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胡长明

2008年10月15日

关于《日本真相》的撰写及出版

代前言

◎ 高 昕

在抗日战争期间，隐居在美国华盛顿的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日本真相》，尘封六十余年之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出版，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作为高宗武的孙子，我愿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日本真相》（英文稿名《深入虎穴》）的撰写以及出版波折的背景情况，如实地提供出来，或许能为治史者起到一点参考作用。

1994年9月24日，爷爷高宗武逝世；2004年3月26日，奶奶沈惟瑜逝世。二老去世之后，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的文电手札（日记）及照片等新史料，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发现了她撰写的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的英文打字稿本两份。一份是用硬壳布面包装，另一份则尚未装



订。之后，我们又发现他手写的中文初稿（即原始稿《日本真相》），约十五万字，内容比英文稿更为详实丰富。可能由于时代背景的关系，有些内容当年未被译成英文。

爷爷和奶奶生前都未曾提及此书稿。通过阅读他们的日记和来往信函后，我才知道爷爷的著书、译书以及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与美国作战情报处合译的英文稿（第一版）

爷爷写作开始于1942年5月27日。当时新上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建议他赶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出版，并答应对爷爷本人及在华亲属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爷爷下笔后，便欲罢不能，到1943年2月完成了中文稿。魏大使介绍美国朋友约翰·库尔格伦（John Kullgren）帮助编辑此稿，并联系出版。库尔格伦当时在美国作战部军事情报处工作（Wa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作者注：War Department 在二战期间统辖全美国除海军之外的一切军事行动，该部部长是内阁成员之一。美国国防部是在1947年才成立的）。库尔格伦曾在中国住过十几年，能说中国话，也会读中文。他住在华府，和爷爷奶奶是朋友，经常往来。在他的帮助下，爷爷与美国作战信息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签订合同，将中文稿译成英文。负责该项工作的是林白乐（First Lieutenant Paul M.A. Lineberger）。主要翻译官是陈爱丽（Ai-li S.Chin）。该机构除了提供信息外，也做配合战争所需的对内与对外的宣传工作。林白乐在1943年6月4日给爷爷的信中，曾讲述了这项翻译工作的性质。他写道：“陈夫

人已经开始翻译你的书稿。她是一个非常聪敏、能力很强的年轻女子。她很快投入翻译。我告诉她，这些资料必须视为秘密军事情报处理。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政府的雇员，她要求能允许得到她丈夫的帮助。我认为应当同意，但是我要陈夫人写一备忘录给你，现附上。如蒙同意，请打电话告诉我。”

陈爱丽曾告诉爷爷，她深知保密的重要性，因为她在沦陷区上海也有家人。她的丈夫陈郁立先生（Robert Chin）出生在美国，就职于联邦通讯部对外广播处，专门研究和分析日本内外的广播节目。他对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将当时译法很不统一的日本人的名字翻译得比较准确。文稿译出后，时任 O.W.I.太平洋海岸分处主任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Director, Pacific Coast Branch）也很感兴趣，提过一些修改建议。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另一位老朋友劳伦斯·索尔兹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也很关心并鼓励尽快出版。这一工作进行到八月，正在联系出版商时，忽然接到 O.W.I.的通知：“国会取消了 O.W.I.在国内宣传的权力，不能以官方名义与出版机构签订合同，所以不能用任何方式促成该书的出版。”因此，O.W.I.在履行了翻译合同后，没有再过问本书的出版事宜了。

斯塔尔参与编辑的英文稿（第二版）

斯塔尔先生（Cornelius Vander Starr，也称为史旦，1892—1968）大名鼎鼎，是个传奇人物。1919年，他带着全部家当美金一万元，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到上海推销保险。他于1921年开创了



亚洲人寿保险公司 (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简称 ALICO), 十年内便由上海扩展到东南亚各国。二战后, 他回到美国, 收购了许多保险公司, 并在美洲、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设立分行。1951 年亚洲人寿保险公司改名为美洲人寿保险公司 (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简称仍为 ALICO)。斯塔尔先生还是个著名的慈善家, 他于 1955 年就出资建立了斯塔尔基金会 (Starr Foundation)。从那时起到今天, 该基金会为亚洲的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创立了控股公司美洲国际集团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简称 AIG)。

日本侵华战争使斯塔尔先生在上海的保险事业一度陷入困境。幸有当时浙江兴业银行总裁徐新六先生的帮助, 才渡过难关, 所以斯塔尔对徐先生感恩戴德。徐新六先生遇难后, 斯塔尔对其儿子徐大春百般照顾, 优礼有加。爷爷在上海时, 先与徐新六先生相识, 并成为好友, 继而又与斯塔尔先生相识。斯塔尔先生除了做生意有方之外, 还热衷于新闻业。1931 年, 他在上海创办了《大美晚报》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该报曾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日本扩张主义, 致使其中一名编辑遭到枪杀。

1943 年 8 月 25 日, 爷爷在斯塔尔先生当时的办公处——纽约市第五大道 101 号拜访了他, 并告知写书一事。斯塔尔对此极感兴趣, 希望尽快看到书稿, 并当即邀请爷爷到他的农庄度周末。临别时, 斯塔尔将爷爷送至大楼的门外。爷爷几次三番客气地请他止步, 不要再送, 但斯塔尔一直坚持, 并很幽默地说, 如果我不送你到门口的话, 我就白在中国呆那么多年了。当时门口挂的招牌是 Starr, Park & Freeman,

In. C.NY (斯塔尔、帕克、福瑞曼有限公司)。同时，这里也是《大美晚报》美国办事处的所在地。

爷爷回到旅馆后，马上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林白乐，请他将书稿用快递寄到纽约。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书稿即被送到。中午，爷爷请斯塔尔先生到旅馆共进午餐，并将书稿交给他。午餐期间，斯塔尔先生看了爷爷写的序言，马上坦率地指出，序言写得太客气，太中国味，解释自己太多，美国人不会感兴趣。

29日，爷爷会同胡适、徐大春先生等人乘火车抵达布鲁斯特 (Brewster)，然后改乘斯塔尔的汽车抵达农庄。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七十五英亩的大农场，三名花工、两名厨师均是中国人。在此次会面中，斯塔尔先生说：“如果你的书未经修改就出版的话，你将来一定很会失望。”

第二天，他对爷爷说，他要组织一些人来编辑这本书，出一本好书。他推荐芙瑞姐·奥特丽 (Freda Utley) 小姐负责编辑，并请《大美晚报》编辑利夫 (Earl Leaf) 协助。

奥特丽出生于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参加过英国共产党，1930年到苏联，曾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工作，并与俄国人结婚。她居住莫斯科六年，曾和其夫去日本呆了一年。1936年，其夫被关进苏联集中营。此后她便携幼子回到英国。1938年，她作为伦敦《新闻记事》的通讯员被派到上海。她1939年到美国，前后出版过 *China at War* (《战火中的中国，1939》) 和 *Last Chance in China* (《中国的最后机会，1947》) 等。

此时，奥特丽正在波士顿 (Boston) 忙其他事情，几天后才拿到稿子。利夫先读了爷爷的书稿。他对徐大春先生说，这可绝对是个极好